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王鴻仁譯

一九二八年

(挪威) 希格麗·溫茜特

(Sigrid Undset)

溫茜特獲獎時才四十六歲。因此，到那時為止，在所有的得獎人當中她是第二年輕的一位——最年輕的一位是一九〇七年的吉卜齡：四十二歲。兩年之後

，四十五歲的辛克萊·劉易士獲獎，使這位偉大的挪威女小說家變成第三名。這個名次一直維持到一九五七年才再度發生變動——那年，四十四歲的法國小說

家卡繆獲得這項全球矚目的文學鉅獎。

溫茜特是第三位獲獎的女性，同時也是第三位獲獎的挪威人。那年和她一道角逐的候選人裏頭有兩位女作家：德國詩人兼小說家胡哈（Ricarda Huch）和西班牙小說家艾斯庇納（Concha Espina）。艾斯庇納極為她的同胞們所敬愛；當她還在世的時候，人們便已經在她的故鄉桑坦德鎮（Santander）為她立銅像了。她這番出馬，有一羣德重士林的西班牙文人在背後大力支持。

和溫茜特一道角逐的挪威候選人當中，有兩位條件也很優越。第一位是奧拉夫·敦（Olav Dunn）——他剛完成一部六巨冊的農民史詩：「朱威克的人們」（People of Juvik）。第二位是布爾（Olaf Bull）——他是一個才華洋溢的抒情詩人：法國詩人魏爾倫（Paul Verlaine）曾經稱他這一類型的人為 *maudits*——受詛咒者。

對瑞典學院而言，頒獎給溫茜特早已成為定局，剩下的只是時間的問題——在「克莉斯汀·拉佛蘭斯達特」（Kristin Lavransdatter）這部巨著完成

之後尤為如此。「克莉斯汀」是一幅偉大的「壁畫」，描繪一種仍然極為原始的中世紀北國生活。它顯示出：它的作者在挪威文壇繼哈姆生、金克、嘉堡而起的新一代作家裏頭，縱使不是最具原創力的一位，也是最具震撼力的一位。溫茜特這部巨著的最後一卷於一九二二年出版，然而她首度參加角逐的日期卻必須往前溯。頭一位負責審查她候選資格的專家，梭德曼博士（Dr. Sven Söderman），提出一份對她相當有利的報告書。梭氏在那份報告書的結論部份極力讚美「克莉斯汀·拉佛蘭斯達特」：

「我閱讀這部作品時不僅深覺興趣，且感到所花費的心力業已獲得極為豐厚的報酬。我已經有好幾年沒有讀過一部足以和它相提並論的史詩作品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比它多采多姿，然而這兩部作品引人入勝的方式不同。大體言之，羅曼·羅蘭那部巨著純粹是投合人們的求知熱忱；溫茜特的巨著則充滿了詩與人的真理；當代文學中，只有寥寥幾部作品堪與之匹敵。此書業已成為挪威文學的一座里程碑……『克莉斯汀·拉佛蘭斯達特』是溫茜特最近的一

部作品，同時也是一部偉構。溫西特單憑它就够資格獲得諾貝爾獎。」

這段熱誠洋溢的評語出現在一九二二年。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些話對那部偉大的歷史小說而言絕非溢美——它始終是溫西特最重要的作品。梭德曼博士對她較早期的作品也是同樣的讚賞、推重。她在那些作品中描寫本世紀初已婚或未婚的年輕女性，並探討她們渴望涉足現代社會之際所遭遇的問題。它們都是以精簡、自傳性質的面貌出現，其中最好的一本當推「春天」——那是一篇優美、輕快的小說，出版於一九一四年。

「克莉斯汀·拉佛蘭斯達志」是一部極為生動，從生到死的自傳。繼這部鉅著之後，溫西特又寫了一部同樣篇幅浩帙，不過卻是以一個男人為中心的小說，那便是「歐登森」(Olav Audunssøn)。該書的首卷於一九二五年問世。一九二六年她再度被提名諾貝爾獎。然後，她於一九二八年最後一次為她的同胞們所推薦。然而這次負責評審的專家是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的會長，霍爾斯陶穆。霍氏很坦白地指出

：在溫西特的一兩部小說裏，原始的野外生活與安適的室內生活之間有點銜接不上。因此，他寫給他的院士同仁們的評審報告並不很熱烈。

可是溫西特獲獎的時機已經成熟，阻撓再也無法發生作用了。在一陣湧自所有斯堪地納維亞國家的熱潮的支持下，這位「克莉斯汀·拉佛蘭斯達志」的作者終於征服了委員會裏頭最頑強反對的委員。除卻拉格洛夫之外，再沒有任何一位北歐作家在外國像她那麼暢銷。儘管——或許應該說「由於」——她那麼不尋常地受歡迎，瑞典學院在那句說明頒獎理由的簡短讚詞裏頭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那部鉅著的名字。它僅陳述，學院之所以將一九二八年的獎金頒給溫西特，「主要是由於她對中世紀北國生活之有力描繪。」

在「克莉斯汀」一書告竣時，溫西特改奉天主教。她承認：這是由於法國大哲學家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的影響——她曾去過巴黎，在那裏遇到馬里旦，對他深為敬慕。在她公開聲明改信天主教之後，她會對圈內朋友們坦言，她相信她永遠無法獲得諾貝爾獎，因為負責遴選得獎人事的學院院士當中有一位厄普沙拉大主教，梭德布洛穆。梭氏為瑞典教會

的領袖，後來他在新教中的地位崇高得像天主教的教皇一般。這位教界的高階層人物具有一種「泛基督教」的精神——這種精神不久之後使他獲得了一九三〇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可是在這位偉大的小說家獲獎後，梭氏卻率先向她道賀——雖然兩人於一年之前曾各根據聖多瑪與馬丁·路德激辯人性與神恩的問題。

在瑞典，雖然沒有人不滿溫茜特的宗教態度，可是他們對她處理獎金的方式卻大感驚訝。她決定將這筆錢悉數捐贈給社會及慈善機關。甚至在離開瑞京之前，她就已經以獎金的半數籌設了一個基金會。基金的利息用來幫助智能不足以及問題兒童的父母，使他們不致骨肉離散。人們都猜測，這是否意味著她本人曾遭遇到類似的不幸？人們更自然而然地為她考慮，她實在應該存下這筆錢，做為養老之用。她後來確實有一陣子非常需要錢。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事。希特勒的軍隊侵入挪威，摧毀了她在瑞典邊界附近，理雷漢摩（Lillehammer）地方的家園，她被迫逃亡。要不然，如果她和蕭伯納一樣，用那筆獎金創立一個純

文學性，或者某種推廣國際間文學活動的基金會，則她應當可以獲得更多人的諒解。

溫茜特於一九四九年去世。死前曾獲得剛結束流亡生涯的挪威國王哈孔（Haakon）破例的恩寵：他將他自己的「聖奧拉夫大十字勳章」賜給她。



一九二九年

(德國) 湯瑪斯·曼

(Thomas Mann)

一九二四年，湯瑪斯·曼快五十歲的時候首度出馬角逐諾貝爾文學獎。在這之前，他已經完成了很多作品——它們剛由一家柏林的大出版商，費雪公司（Fischer Verlag），薈集成全套十冊出版。而且，那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舉世聞名的作家——由於他那部出色的小說，「布登布魯克斯」（Buddenbrooks）。這部小說是以他早年的生活為題材。人們一致公認，這部描寫中產階級的作品乃是德國自然主義文學中的傑作；它紹繼了托爾斯泰以及一些北歐小說家如奇蘭（Kielland）、黎（Lie）、雅各森（Jacobsen），以及班（Bang）等人的偉大傳統。湯瑪斯·曼將這些人看做老師，引述他們的話語。一九二四年，他剛宣布：他即將推出第二本大部頭的作品，「魔山」（The Magic Mountain）——這部作品將使他成為當代德國文壇的頂尖人物之一。

所有關於他的審查報告都是由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的會長霍爾斯陶穆執筆的。霍氏一再指出：雖然湯瑪斯·曼於一九二四年底推出「魔山」，可是他仍可單靠「布登布魯克斯」一書取得獲獎的資格。雖然他的另幾部小說——特別是「特里斯坦」（Tristan）、「托尼歐·克洛格」（Tonio Kröger）以及「死於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均有極為深刻的心理分析與高度的藝術造詣，可是這些還不足以確定他的獲獎資格。

「死於威尼斯」是這位得獎人畢生創作的最高峯。它那精緻的風格令人回想起普魯斯特（註）。然而，在霍爾斯陶穆眼中，這本書被它那有點猥褻的故

（註）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偉大的法國小說家以「往事追憶錄」揚名於世。

事破壞了——它描寫一個老詩人對一個美貌少男的「柏拉圖式的愛」。書中那種高超的文體以及對感情的精密分析都不能改變霍爾斯陶穆的看法：

「這項幾乎令全世界爲之風靡的草率勾當，像其他許多具危險性的事物一樣，必須對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夕歐洲的腐敗負責。」

後世並不同意這項嚴苛的批評。

至於「魔山」，霍爾斯陶穆對於那些用來解釋現代世界的概念十分感興趣，他也很喜歡那種象徵性的背景——一所與世隔絕，自給自足的豪華療養院。然而他看不慣的是：從藝術的觀點言之，這部極富洞見的小說是一個失敗之作。他評論道：

「這位作者只有寥寥幾部傑作足以使他獲得像諾貝爾獎這樣的殊榮。將此書也一併列入應當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此，當瑞典學院表明她頒獎的動機時，她的讚美也像霍氏的審查報告一樣，是「有幾分保留的」。學院的讚辭是這樣的：一九二九年的諾貝爾獎所以頒給湯瑪斯·曼，「主要是由於他的偉大小說『布登布魯克斯』——它成爲當代文學經典作品的地位一年比一年鞏固。」

像「魔山」這樣重要的作品、這樣到處受讚揚的作品，瑞典學院的「判官們」竟然對它不加聞問，難怪湯瑪斯·曼要覺得沮喪、惱怒了。他於一九三〇年寫了一封信給紀德，在裏頭大發牢騷：

關於這部作品，我所聽到的盡是非常不諒解的評語。指責的人大多想要證明它不是一部小說，而是理性及一種批評精神的果實。奇怪的是，一位對諾貝爾委員會相當有左右力的名批評家，波克教授（Fredrik Böök），曾當衆形容這部作品爲蹩腳的藝術品。因此，學院頒獎給我，主要應該是由於我的早期作品「布登布魯克斯」。從各方面言之，這是院士們共同的心聲。根據所有的證據，學院業已完全走偏了。單靠「布登布魯克斯」，我絕對無法獲得鞏固的地位，使學院決定頒獎給我。總歸一句，我在這個世界的地位確實是由這部倒楣的小說造成的。我深信，它的事實性不但沖淡了它所包含的分析與哲學性的討論，並且使它的內容和藝術價值顯得特別突出。

然而，湯瑪斯·曼很早就問鼎諾貝爾獎了。他的候選資格在他那本引起爭論的小說出版之前就已經受到了學院的重視——雖然說獎金是在五年之後才頒給他的。他的推薦人裏頭包括德國文壇的老前輩以及一九一二年的諾貝爾獎得主，霍卜特曼。他是最先推薦湯瑪斯·曼的人，而且用了最熱情的話。在他寫給瑞典學院的信中，他說：在同時代的作家中，沒有一個比湯瑪斯·曼更當得獎，因為他是「一個絕對完美的上乘之材，思想不僅有深度，同時有條理，一切最好的德國特質都在他的身上顯現。」

我們應當假設，霍卜特曼那時候完全不知道湯瑪斯·曼已經用一種接近漫畫的形式，把他描寫成「魔山」裏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年高德劭、派頭十足的皮博康先生（Mynheer Peepkorn）。後來，這位「準得獎人」以間接的方式承認了這件事情：他曾正式請求這位「模特兒」的寬宥。可是當人們公開指控他這件事時，湯瑪斯·曼卻激烈地抗議說他沒有「以戲弄的方式冒犯這位當代德國最偉大的作家。」他毫不掩飾他的氣憤，他在他寫給許多人的信中形容這項指控為「虛假、令人震驚，刻意嘩衆取寵。」奧斯

特林到現在還記得這個事件。當時他是唯一於一九二九年再度推薦湯瑪斯·曼的人。最後他終於說服多數的院士，把獎金頒給他。

一九二九年的候選名單上共有二十四位來自各國的作家，可是事實上那些人當中，只有一位在成就上足與湯瑪斯·曼一別苗頭。那個人便是偉大的德國詩人，史蒂芬·喬治（Stefan George）。喬治是一個抒情的天才，他的才華連外國人都已經漸漸體認到，那時他剛剛獲得歌德獎——一項姍姍來遲的榮耀。可是他有些作品相當晦澀，頗像法國詩人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的作品——事實上這兩個詩人經常被拿來做比較研究。這些作品的讀者始終——也將永遠侷限於少數的高等知識份子。數年之後，奧斯特林曾建議同時頒獎給喬治和梵樂希，可惜沒有被瑞典學院採納。

在獲獎之後的幾次記者招待會中，湯瑪斯·曼一反常態，裝出一幅謙遜的臉孔，並且宣稱，瑞典學院選上他而卻忽視兩位同胞，胡哈和何爾茲（Arno Holz），他感到很遺憾。有一點很確定，那就是何爾茲是一個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家，以前雖然被提名好幾

次，卻從沒有被認真考慮過。那年瑞典學院又接到了一份推薦何爾茲的函件。那是一份鉛印的文字，寄自何氏的故鄉，東普魯士，有幾百個教授和作家在上面簽名。這封推薦信把「哈姆雷特老爹」(Papa Hamlet)的作者——何爾茲——描寫成德國自然主義運動的先驅及大宗師。何爾茲在學院決議頒獎給湯瑪斯·曼之前幾個禮拜去世。

湯瑪斯·曼對這件事並非毫不在乎。他曾寫了一封信給霍卜特曼，在信中表達他這位頑強的對手——何爾茲——的真正看法：「那將顯得十分荒謬，同時可耻：整個歐洲都會把臉掩起來，而且會感到狼狽不堪。」

湯瑪斯·曼獲獎時，德國輿論界響起一片讚美之聲。然而也夾雜著幾聲「不和諧的音符」。並不是有人對他那些偉大作品的文學價值有所懷疑，而是柏林幾家保守派的大報對於他政治思想的發展十分不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還十分醉心非特烈大帝的那位湯瑪斯·曼業已變成民主政治的使者——由於民主政府」經成了新德國的政治體制。」Berliner Lokal-Anzeiger(柏林地方導報)如此說道。這家

報紙甚至指控他：因為新的民主政府極力攏絡他，所以他就替新政府說話。這時候，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已經隱約可見——後來湯瑪斯·曼對它大加伐撻。

法國輿論界對這位新的德國得獎人一致讚美，他們不僅形容他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歐洲人。

湯瑪斯·曼全家前往斯德哥爾摩，從瑞典國王手中領取諾貝爾獎，而且在那兒受到歡迎、尊敬，並且贏得同情。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在市內的諧和宮舉行，由前任總理哈瑪紹(註)主持。波克教授代表瑞典學院發表介紹辭。

訪問斯德哥爾摩期間，湯瑪斯·曼當衆選讀了他手邊一部新著「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裏面的若干章節。這部小說的第一卷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第四卷，亦即最後一卷，於一九四二年才出版。它展開了一個新的「密集創作期」，除了推出一些出色的作品，(有

(註) 這位哈瑪紹(Hjalmar Hammarskjöld)為故聯合國秘書長Dag Hammarskjöld的父親。

大部頭的，也有小部頭的），還推出扣人心弦，而且極生動的歌德傳記：「洛特在威瑪」（Lotte in Weimar）——一部真正出類拔萃的歷史小說。有件事學院曾極力保密，然而現在已經有很多人知道了：那便是，曾經有兩位瑞典學院的院士於一九四八年第二度推薦他問鼎諾貝爾獎，「由於他隨後那些重要的作品。」這項提議使諾貝爾委員會們展開熱烈的爭論，研究同一個人兩度獲得同一項獎金，在原則上是否行得通。結論是：這樣做抵觸了捐款人遺囑中的規定。

一九五〇年諾貝爾委員會出版了一本紀念創立五十週年的大書。奧斯特林在那本書中極力讚美湯瑪斯·曼——他所讚揚的那位湯瑪斯·曼與其說是「布登布魯克斯」的作者還不如說是「魔山」以及其他成熟傑作的作者：

這部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它的價值業已因歲月賦予它的「銅綠」而更為提高：無疑的，它的獨特風格，足與他那部描繪一個偉大中產階級家庭的早期作品相提並論。可是爭論愈來愈廣泛，

而現在絕對不乏比較的材料。很少得獎人能在得獎後推出一整系列的新作——湯瑪斯·曼便是其中之一，而且他有幾部作品是在流亡之時完成的——在那種情況下，他不惟需要最大的自制力，並且需要一種吾人幾可稱之為超人的反抗闖志。



一九三〇年

(美國) 辛克萊·劉易士
(Sinclair Lewis)

一九三〇年左右，該輪到美國獲得諾貝爾獎了。這件事情不僅在諾貝爾委員會的年鑑上，就是在歐洲人對北美作家的態度上也都是一個轉捩點。從一般文藝學院的標準言之，他們由於獲得這項鉅獎而頓時身價百倍。要達到這點可真需要多年的工夫。確實，瑞典及時地表露了它對新大陸文學的仰慕，並選擇美國小說家劉易士做為致敬的對象——這對瑞典這個負責遴選得獎人的國家而言是很有面子的。

許多年來，美國在歐洲人的眼中是一塊探險的好地方，移民與尋金者的目的地，要不然就是口若懸河的生意人或滿口金牙的華爾街暴發戶的樂園。自由女神像、愛迪生的留聲機、福特的汽車，以及梅克·塞尼特 (Mack Sennett) 的喜劇電影——這些東西乃是美國文明的最著名的代表物，該文明被人認為「全然缺乏真正的文化」。從文學的觀點看，沒有什麼

東西可以使遊客流連忘返的。好不容易才出現的朗費羅和愛默森充其量只達成某些「貧血的」文學造詣，而且那些成就業已成爲過時之物了。

寫「最後的莫希根族」(The Last Mohican) 的庫柏 (Fenimore Cooper) 或者寫「頑童流浪記」(Huckleberry Finn) 的馬克·吐溫都被歸類爲「兒童書」的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開始出現的新名字仍未爲矯揉造作的沙龍所接受。傑克·倫敦以及厄普吞·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讀者局限於工人階層。在學院院士們的眼中，他們都太過粗糙，不太適宜成爲得獎人。同時，他們書中所探討的社會主義思想使歐洲的批評家們更加覺得他們是些鹵莽的天真派。

然後，美國參戰了。由於威爾遜總統，舊世界開始注意新大陸的文學。這種好奇心是相當自然的，因

此人們開始研究美國的東西。人們開始探討：隱藏在那個直到那時還很普遍的「錯誤形象」背後的那些強大力量究竟是什麼。凡爾賽和約簽訂後的幾年間，美國對歐洲的影響愈來愈大，因而那些專門探索人們在那個「摩天大樓之地」如何生活的美國文學，很明顯地已經開始獲得相當的重視。

傳統上，人們總是認為美國文化十分鄙俗。此時，歐洲人如釋重負地發現，這些來自大西洋彼岸新作家絕非如此。他們是第一批攻擊他們同胞的人，攻擊他們那種張牙舞爪、虛張聲勢、洋洋自得、裝腔作勢。孟肯(H. L. Mencken)、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辛克萊·劉易士這一類的美國作家顯然是和他們在歐洲的同志一致行動。他們揭穿他們的「獵物」的假面，取笑它們，用石頭打它們。而它們對他們的公開指責以及他們之拒絕受害——這些和巴黎及倫敦的知識份子們所感覺到的憎惡是一致的。因此他們的作品在歐洲激起了很大的興趣。就連一些在其他方面不肯為任何形式的「美國精神」所動的團體也都感覺到了他們的力量。他們這種多少有點露骨的激進方式可能使若干人緘口不言，然而更多人對於他們

這種為歐洲人所歡迎的批評態度抱著同情的態度。

美國成了一種熱門，每年諾貝爾委員會的討論中，美國作家的名字常常被人提起。一九三〇年，輿論預測從一開始就傾向於一面倒。當然，每個人都知道，萬眾矚目的法國候選人是保羅·梵樂希，然而柏格森已經於一九二七年獲獎，相隔這麼短，看來法國作家不太可能會再度入選。俄羅斯的高爾基是一個强有力的候選人，可是，要瑞典學院公開表揚一個蘇聯的「忠貞黨員」(party stalwart)實在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德萊塞自己對蘇維埃份子的露骨的傾慕，對他的競選資格大為不利。而且對學院的院士們而言，讀他那些大部頭的作品一點也不令人激動。

辛克萊·劉易士的情況就不同了。瑞典學院裏頭幾位頗有影響力的院士業已注意到他的作品，而且他們的評語——不管是口頭的或是發表在報紙上的——對他都相當有利。「大街」(Main Street)、「白壁德」(Babbitt)、「愛斐斯密」(Arrowsmith)俱為瑞典的暢銷書。劉易士的候選資格已經成熟，當「達滋沃斯」(Dodsworth)於一九二九年獲得成功時，他獲獎的時刻似乎已經來臨了。在瑞典學院裏

頭，率先爲劉易士爭取這項鉅獎的是慧眼識英雄、曾經提拔過好幾位優秀作家的修克教授。他讚揚這本書爲一部新的傑作，而在十一月五日，劉易士獲得多數院士的支持。大體說來，這項結果是在人們意料之中，它獲得了舉世的喝采。

同樣令瑞典人滿意的是，劉易士打算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一般得獎人都是以年邁爲辭，不來參加頒獎典禮。劉易士則沒有這個問題。那時他才四十五歲，是僅次於吉卜齡的最年輕的一位文學獎得主。他的獲獎也同時滿足了一種頗爲普遍的渴望——希望看到一個從容悠閒的「老美」，不會說些不著邊際的話，而且易於採訪。就個人而言，這位貴賓有些個性和他的東道主相同。他出生於明尼蘇達州，那兒從十九世紀起就住滿了瑞典移民。他的小說裏頭有幾個瑞典的角色，其中最主要的一位便是「愛婁斯密」裏頭那位人人敬愛的宋德里烏斯(Sondelius)。在橫渡大西洋的旅途中，劉易士和他的記者太太桃樂斯·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爲了要應付這件事，特地研讀「瑞典文十課通」——附在一組唱片裏的文法書。

「醫生在那裏？敬大家一杯威士忌！」這些話是劉易士歡迎新聞記者的話——那時天快破曉，記者們登上泊在瑞典海岸外的船上。「我認爲一個諾貝爾獎得獎人是一個道貌岸然、嚴肅的傢伙——不像我這樣的人物。他們把獎金頒給一個記者，還是第一次。我是一個記者，我整個生命就是一個報導的工作。當國王頒獎給我時，我覺得我應該說，『陛下，你相信你没有領錯人？』」

馬克·吐溫寫過一本怪誕的幻想小說，描寫一個「老美」在亞瑟王宮庭內的奇遇。劉易士的瑞典之旅絕不是這一類的打諢劇。這位得獎人從頭到尾都極爲泰然，他赤褐色的臉孔放射出一種令人傾慕的怡然自得的神情。悠長的頒獎典禮中，他始終莊重地坐著，留意地聆聽卡爾菲爾特用瑞典文發表的優美演講。卡爾菲爾特爲瑞典學院的常任秘書，這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公開的儀式，因爲他於翌年去世。

劉易士以一種歐式的鞠躬向國王敬禮，稍後，在傳統性的宴會中，他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講，表達他的謝意，結果獲得滿堂的彩聲。次日在皇宮，國王爲得獎人舉辦的傳統性午宴中，劉易士用流利的瑞典語

對國王的弟弟查理親王解釋，「麻雀是一種尾巴硬挺、跳來跳去、吃小蟲的小鳥」。這是「瑞典文十課通」裏頭的一個句子。親王用英語和他繼續交談下去。

劉易士逗留在斯德哥爾摩期間最突出的事件便是他在古老的瑞典學院大廳裏發表的演講。他的演說辭題目叫「美國人對文學的恐懼」。他的聽眾們對他說話時的自然、輕鬆感到十分深刻。根據他個人的經驗，特別是「艾爾瑪·根翠」(Elmer Gantry)一書遭遇到的命運，他繪出一幅可怖的圖畫，揭示一個思想開放的作家在一個聚滿大學教授的封閉文化環境中的工作情況。他說明道，美國官吏畏懼一切文學作品，因為它們專挑他們的短處，毫不客氣。他除了雄辯滔滔地列舉許多令人折服的例子來說明這項事實外，還相對地推出另一種「形象」——一個正在進行新的文學革新並推出抗議陳腐的作品的新家。他旁無吝惜地描繪幾位够資格獲得諾貝爾獎的同道的側影——厄普吞·辛克萊、德萊塞、歐金·奧尼爾、蕭伍德·安德遜。以同樣的精神，他引述年輕一輩作家的話——湯瑪斯·吳爾夫(Thomas Wolfe)，桑敦·懷爾德(Thornton Wilder)，海明威。這一切促使人

們明白他的思想是多麼開放、他的心胸是多麼寬闊，他的眼光是多麼銳利。想想美國文學日後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將來對諾貝爾委員會的影響力，我們就不難瞭解他這席話確實是有些先見之明。

喬治·白璧德(註)以及他的美國同胞對這件事

(註) George Babbitt「白璧德」一書的主角，為劉易士眼中的典型美國人。



情的看法究竟如何？劉易士獲獎的消息傳來時，一場激烈的抗議爆發了。在紐約，人們指責瑞典選擇一位令人厭惡、批評自己故鄉的人。劉易士在斯德哥爾摩的演講引發一陣嚴峻的抨擊，所持的理由是「家醜不可外揚」。

這些叫囂催生了一本小書，叫「辛克萊·劉易士為何獲得諾貝爾獎」，書中搜集了頒獎典禮上卡爾菲爾特那篇介紹辭的英譯，以及劉易士那篇著名的演講。劉易士對卡爾菲爾特的演講辭做了一處修正：那位瑞典學院的院士對梭克中心（註）做了一些簡短的介紹——那是劉易士的出生地，他說：酷暑和缺乏陰溝

使那個小鎮充滿臭味。劉易士寫道：「這點卡爾菲爾特博士大錯特錯，雖然在我那時候，中西部的小鎮既沒有陰溝也沒有清道夫，可是每一個家庭都能處理他們自己的垃圾。雖然天氣酷熱，可是到處飄散的氣味卻是野玫瑰與以繇互好幾千英畝的小麥田的芬芳——密集開墾地區的那種難以形容的氣息。」

在這段洋溢著田園氣息的字句中，辛克萊·劉易士暫時忘却了諾貝爾獎帶給他的不快經驗。

（註） Sauk Centre 即「大街」一書中的高佛牧場（Gopher Prairie）。

一九三二年

（瑞典）愛理克·艾克賽，卡爾菲爾特
（Erik Axel Karlfeldt）

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瑞典學院決定將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瑞典的抒情詩人卡爾菲爾特——此時卡氏已經去世凡六個月矣。卡氏生前為學院的常任秘

書。他的同事們為什麼會選上他呢？這要歸功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院士：厄普沙拉大主教。這位大主教本人也在一年前獲得挪威國會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可

是，當瑞典學院決定頒獎給卡爾菲爾特時，這位大主教也已經去世三個月了。這真是一樁棘手的巧合——它顯示出，諾貝爾遺囑裏頭的規定已經被人稍稍修改過了。人們立即羣起圍攻瑞典學院，因為它竟然把獎金頒發給一個業已去世的人。

這些誅伐的文字在瑞典最為激烈。瑞典學院對這些批評家的答覆是，諾貝爾獎的規章明白允許頒獎給業已去世的人，只要這個人的推函薦是在他去世之前提出的。卡爾菲爾特的情況確實是如此。從另一方面言之，很多人都知道，從一九一八年起，瑞典學院好幾次頒獎給他，都一再地爲他所堅辭。他拒絕的理由是，他個人是學院的官員，而且是諾貝爾委員會裏頭一位頗有影響力的委員。當卡爾菲爾特六十八歲——那是正常的退休年齡——他對同事們表示他打算放棄他已經擔任了二十年的常任秘書之職。結果，學院的院士們認爲，從那時候起他不應再有任何顧慮，他也不當再反對他們一致的決議了。此外，他們私下談論著：頒獎給卡爾菲爾特，則他們可使另一位同樣備受敬愛，而且也已經去世的同事達成遺願。

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厄普沙拉的大主教早已看出

，學院可能會採取折衷措施，將獎金同時頒給卡爾菲爾特及霍爾斯陶穆。霍氏是一個偉大的文人，繼卡爾菲爾特出任學院的常任秘書。霍氏已經擔任諾貝爾委員會會長之職好幾年，現在他必須身兼二職。這一來就有雙重理由可以解釋何以他的候選資格沒有經過進一步的討論就便剔除——而且事實上是霍氏本人堅持要把它剔除的。

這年的抉擇並非由於沒有其他人參加競選才這樣做的：參加角逐的大約三十位，包括在接下來的兩年中獲獎的高爾斯華綏和伊凡·布寧。候選名單上至少有三個法國人。第一位是保羅·梵樂希，他於一年前首度被一羣他在法蘭西學院的傑出同事們所提名，接著由倫敦大學的法文教授，梭拉特(Denis Saurat)二度提名。第二位是已經角逐過好幾次的艾斯陶涅。第三位是詹美士(Francis James)，一位歌詠巴斯克(Basque)鄉間美景的詩人，由奧斯特林所推薦。一九三一年參加角逐的德國人有史蒂芬·喬治，著名的抒情詩人；保羅·厄恩斯坦，一位極受尊敬的詩人和散文家，他的名字很久以前曾經爲一大羣哲學教授所提出；還有赫塞，他今年首度由霍卜特曼提名

，而終於在十五年之後獲獎。我們千萬不可漏掉雷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他被提名並非由於他那部於一九一九年推出的最著名的戰時小說「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而是由於較近一點的「歸途」(The Way Back)。小國家的代表中有希臘的帕拉瑪斯 (Koster Palamas)——他是由一九〇九年的得獎人拉格洛夫和一九一六的得獎人海登斯坦極力推薦的。

在瑞典國內，卡爾菲爾特的詩作的藝術價值從沒有人懷疑過。然而由於他那些詩作和它所用的文字有無法分割的關係，所以在國外他的詩只有少數精通瑞典文字的人才能品嚐——因為不管多麼忠實的翻譯總難免會損害原著的面貌。卡氏的詩確實被人零零星星地翻譯過，不僅被譯成英文和德文，同時也被譯成法文——然而通常都是以非韻文的形式出現。這是由於英文和德文比拉丁語系的文字更容易傳達原詩那種叶韻的豐富譬喻。偶爾也出現一些不以爲然的論調，不過它們大都是在指責瑞典學院開惡例，不衡量現實情況，頒獎給一個業已作古的作家。一家瑞典大報竟然

氣憤到說，根據一切證據，同時，不管在這個事件之後會再出現什麼先例，捐款人諾貝爾先生的原意絕不是要用這些獎金來資助孤兒寡婦的。

一九三〇年的正式頒獎典禮，卡爾菲爾特以他慣有的風趣、有力的口才發表演講，讚美辛克萊·劉易士。然而那時他已經身罹重病——幾個月後他因這個病而撒手人寰。在一九三一年頒獎典禮上發表介紹辭的是奧斯特林——十年之後，奧氏繼他成爲瑞典學院的常任秘書。

